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 文史通义

罗炳良 译注

【上册】



中华书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罗炳良 ◎译注

# 文史通义 上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义/罗炳良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834 - 2

I . 文… II . 罗… III . ①史学理论 - 中国 - 清代

②《文史通义》 - 译文 ③《文史通义》 - 注释 IV . K092.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9738 号

---

书 名 文史通义(全二册)

译 注 者 罗炳良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王守青 舒 琴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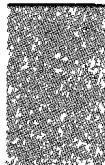
印张 48 1/8 字数 1000 千字

印 刷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34 - 2

定 价 97.00 元

---



## 前　言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乾嘉考据学发展趋势，产生出不少考据学大家，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更是汗牛充栋，在考证历史事实和考证史书讹误两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是文史理论总结趋势，产生出以浙东学派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批评性与总结性相结合的史学思潮，对 18 世纪以前的整个中国史学作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其重要特征是以探讨史学理论为主兼及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居于这座理论丰碑顶端的著作，就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 —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其生活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值乾隆中叶至嘉庆初年考据学风靡全国的时期。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举世崇尚考据的时代，却不追随流俗从事考证，而是针砭学术，探究校讎源流和史学义例，注定了其学问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在乾嘉年间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却又性情孤傲，命运坎坷。但是，仕途的挫折和治学的寂寞也造就了他不甘屈服世俗、勇于另辟学术蹊径的顽强性格，生命不止，著述不辍，不仅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中国史

学开辟出一方新天地，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史理论和治学方法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章学诚少年时代资质并不聪慧，“二十岁以前，性绝駸滯，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章学诚遗书·家书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同时身体素质也不是很好，“幼多病，一岁中铢积黍计，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因体弱多病，时常废学。十五六岁以后，知识渐开，喜好泛览群书，在父亲章鑑的启发诱导下，开始对史学发生兴趣，曾经在塾课之余取《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试图按照纪、表、志、传体例编撰纪传体裁的《东周书》，已撰成百余卷，后为塾师发觉而终止。这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1762），章学诚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不谙世故，屡屡受挫。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始余入监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然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决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过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齿；同舍诸生，视余若无物。”（《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当时只有沈业富、朱筠和朱棻元等极少数人了解章学诚，赏识其识解。沈业富俾其坐馆于家从事铅椠，朱棻元荐其与修《国子监志》，朱筠则招其入门受业。章学诚从朱筠问学，不仅得到朱筠言传身教，而且得交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知名学者，学业大有长进。这一时期他治学的重点仍然在史学，“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渝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在艰难购书的基础之上，章学诚开始深入研究纪传体史书。他说：“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马、班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

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在京的十余年中，章学诚虽然屡试不第，蹭蹬科场，饱受世人讥讽，被人“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从未动摇治史的决心，在学业上逐步趋于专精和成熟，为其文史撰述打下了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学诚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然而他自知性格与社会格格不入，不敢走仕途之路，而以教读与著述为生。他晚年回忆自己“屡困棘闱，晚登甲第……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文墨干人，前后奔走，几三十年”（《柯先生传》）。因为常常失职，生计无着落，不得不奔走各地谋生，足迹自京师而外，北到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西到陕西华州（今华县），南到湖北武昌府（今武汉市）、安徽亳州（今亳州市），流离患难，备尝艰辛。他后来回顾说：“自庚辰始赋远游，于今三十六年。余兹六尺之躯，亦备历崎岖险阻，颠倒狼狈，极人世可悲可愕之境，非一日矣。”（《渝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在这三十多年中，他曾经主讲永平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定武书院、文正书院，为地方官吏撰修《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以及《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书。坎坷多难的生活，寄人篱下的滋味，使得章学诚于“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与史余村论学书》）；加以“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家书二》），饱受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反而迸发出向艰难困苦的环境抗争的极大勇气，经常是“江湖疲于奔走……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与邵二云论学》），始终不断地坚持史学义例和校讎心法的研究。尤其是晚年双目失明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著述之事，口授倩人代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总结校讎义法和文史理论。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与胡维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注重把握各家的著述宗旨；又

特别声明“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时有所窥”（《家书三》）。正因为他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治学非常突出“鄙人所业，文史校讎，文史之争议例，校讎之辨源流”（《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的特色，撰写出《文史通义》和《校讎通义》两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章学诚在这两部名著里表明了“从事于文史校讎，盖将有所发明”（《上辛楣官詹书》）的学术旨趣，形成了史学贵在著述成家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与汪龙庄书》）在这部书里，最显著的特点是阐明史学家法和为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义例，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积弊，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同时，章学诚还把校讎学也纳入史学的大范畴。他指出：“学术同堂而异室者，知之不易。北宋史才，尹氏之识，二刘之学，已各不相蒙；南丰曾氏史学，本于向、歆父子，乃校讎之学，非撰著之才也。”（《知非日札》）亦即校讎学可以包括在史学范畴之内。他还认为：“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和州志志隅自叙》）这说明撰著之体和校讎之业都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同源而异流。因此，章学诚拟在《文史通义》外篇中作《校讎略》，作为内篇文史理论的羽翼之笔，这从《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下两篇的注文中可以得到证明。后来在撰写过程中内容不断增加，才扩充为一部自成体系的独立著作，定名为《校讎通义》。本书阐明了校讎学的目的与任务，考察了校讎学的起源和演变，提出了校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集中国古代校讎学之大成的著作，其中的许多理论见解都能和《文史通义》相互补充发明，是章学诚留给后人的又一部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

## 二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章学诚无疑是一位以阐述理论见长的史学

家。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表现出集理论总结之大成的特征，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水平来看，章学诚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中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在《易教》、《史释》诸篇阐述的“六经皆史”理论，继承元、明两代学者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不仅超出了前辈学者的认识范围，而且给“六经皆史”学说赋予以史明“道”的含义，达到了古代学者认识这个问题的最高水平。他在《史德》篇提出的以心术论“史德”理论，不仅继承了春秋时期孔子主张的“良史书法不隐”、唐代史学批评理论家刘知几推崇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思想，关注史家记载历史是否能起到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而且继承了南朝梁刘勰提出的“素心说”、明代胡应麟提出的“公心说”，然后继续探讨史家具备褒善贬恶的公心以后其历史认识是否即可完全符合客观历史实际，达到历代史家关于历史认识论中史家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理论的最高水平。他在《申郑》、《答客问》诸篇阐述的撰述与记注、史法与史意理论，是继承汉代司马迁、唐代刘知几、宋代郑樵等人的思想而来，阐明历史学必须具备撰述和记注两家之书，而史学家修史必须做到心知其意，运用别识心裁，真正达到史学成一家之言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境界。可以看出，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做了全面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学诚史学的理论建树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终结。

第二，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进程来看，章学诚史学的理论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特点。其中有些问题是继承前代史学的理论成就而来，并对后世史学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书教》诸篇对历史发展中“时势”的认识，就是继承汉代史家司马迁、唐代史家柳宗元和明末清初史家王夫之等人重“势”的思想而来，而对 19 世纪史家龚自珍、魏源等人从“时势”方面着手考察清代国势衰弱，寻求改革社会积弊

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启示意义。他在《原道》诸篇对历史演变之“道”的认识，是继承唐代学者韩愈等人《原道》思想而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进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和规律，为晚清学者龚自珍提出“欲知道者必先为史”的主张架设了学术阶梯。他在《史释》、《浙东学术》诸篇对史学“经世致用”的认识，乃是继承唐代史家杜佑，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史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精神而来，针对清代中叶传统文化史上汉宋学术之争作出实事求是总结和评价，藉以促进新文化与社会平衡的发展，这对于嘉道以后乃至近代学者在新形势下认识中西文化优劣和提出文化救国主张都有直接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章学诚在前人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而产生的新认识，然后形成内涵较为新颖的概念，并且对后代史学的理论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史学所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第三，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发展形式来看，章学诚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些内容侧重于总结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他关于“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关于“古”“今”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社会历史演变之“道”的理论，均为历史理论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而有些内容则侧重于总结史学本身的理论，他关于史学性质、史家素养、史学功用以及方志学义例中阐述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等等，都是史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例如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另一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相比，具有两点极其明显的特征。一是章学诚论史书体裁义例，并非以静态的方法，横向比较两种体裁之间的异同，评价其各自的优劣，而是用动态方法，在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之中横向和纵向加以比较，不但看到了不同体裁之间各有利弊，而且认识到同一体裁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优劣。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不同体裁综合起来分析，从而揭示出各种体裁之间相互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是章学诚论史书体裁义例，并不过多地拘泥于史法，强调史书体例的纯正划一，而是从史法和史意两方面入

手,由史法求史意,避免以史意徇史法,灵活地看问题,形成了史书体裁辩证发展和演变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理论做出了新贡献。还有一些内容则偏重于总结史学方法论,他关于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提出史学批评必须考虑到被评价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不能脱离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而抽象议论评价,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最具历史主义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理论内涵涉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可谓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对章学诚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得出更加符合其实际价值的正确结论,这对于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的理论价值,乃至进而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价值,并以此为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精华,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的理论内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都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三

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在生前曾经刊印,但因该书撰写时间前后历时三十年之久,某些计划撰写的篇章直到去世也没能写出,所以只能选刊一小部分,而无法包括全部,刊刻完本。由于他生前未及编定篇目,临终前委托浙江萧山学者王宗炎校订。王宗炎校订的《文史通义》篇目为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其中外篇内容为议论、序跋和尺牍。王宗炎逝世后,章学诚次子章华绂认为“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大梁本序》),于道光十二年(1832)刊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并附《校雠通义》三卷,刊刻于河南开封,是为大梁本。章华绂刻本内篇已和王宗炎校订篇目有出入,外篇内容则完全不同,收录章学诚所撰写的各种方志序例。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20年根据会稽徐氏抄本

刊印《章氏遗书》，但未能包括章学诚的全部著作。1922年，吴兴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根据王宗炎所定篇目，又广为搜集，刊刻《章氏遗书》五十卷。其内容包括《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信摭》、《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各一卷，《永清县志》十卷，《和州志》三卷，《历代纪年经纬考》、《历代纪元韵览》各一卷，书后另有《补遗》、《附录》和《校记》，比较全面地包括了章学诚的著作。从此，《文史通义》除大梁本之外又有另一个版本，即《章氏遗书》本。

20世纪对于章学诚著作的整理与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935年，叶长清的《文史通义注》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一印行，1970年又由台湾广文书局出版。1956年依据《章氏遗书》本整理的《文史通义》，由当时设在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出版。1948年叶瑛依据大梁本《文史通义》整理著成《文史通义校注》，于1985年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整理吸收了叶长清注本的长处，同时利用《章氏遗书》本对大梁本加以校订、注释，旁征博引，资料翔实，对于世人理解《文史通义》很有裨益。1985年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影印嘉业堂刻本《章氏遗书》，另据其他各种抄本增补十余篇佚文，题名《章学诚遗书》，是迄今收录章学诚著作最为丰富的整理本。仓修良的《文史通义新编》，于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钩沉索隐，试图按照章学诚原意恢复《文史通义》本来面目，不仅包括了通行的两个版本中218篇文章，而且选录《章氏遗书》和部分逸佚的85篇文章，重新加以编排整理，内篇以《章氏遗书》本为主，增加大梁本多出之篇；外篇编为六卷，前三卷收录驳议、序跋、书说，后三卷收录方志序例、论文；而增补各篇则按类编入各卷之中，成为《文史通义》一个新的版本。严杰和武秀成的《文史通义全译》，于1997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对于《校讎通义》的整理，有王重民编定的《校讎通义通解》，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上述整理版本不仅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使用，而且有助于准确地理解章学诚思想广博而深刻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条件。

我从2003年开始，就给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文史通义》研读课程，至今将近十年。历届学生和我共同学习，相互讨论，不断加深对这部史学经典名著的认识和理解。这次译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我们通过对两个版本的比较，认为大梁本能够集中反映章学诚的文史理论成就，所以选择这个版本作为底本。同时借鉴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严杰和武秀成《文史通义全译》以及其他研究章学诚著作中标点、翻译和研究的成果，择优吸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注释和翻译。对于上述学者的成果，表示诚挚敬意和感谢！为全面反映章学诚的思想，对于《章氏遗书》本与《大梁本》共有的篇目，前者较后者多出的内容，本书均在注释中加以补录；两者差异较大的语句，则在注文中标出；至于两者个别文字不同而又没有实质性差别，则不再出注。在译注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张峰、刘开军、张宇、黄格林、陈健、刘燊楠、胡昕、金久红、刘伟等同志，或帮助校对文稿、或帮助核对引文，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本书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们批评和指正。

2012年7月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序

先君子幼资甚鲁<sup>①</sup>，赋禀复瘠弱，少从童子塾，日诵百余言，常形亟亟<sup>②</sup>。先大父顾而怜之<sup>③</sup>，从不责以课程。惟性耽坟籍<sup>④</sup>，不甘为章句之学<sup>⑤</sup>。塾师所授举子业，不甚措意。塾课稍暇，辄取子史等书，日夕披览，孜孜不倦。观书常自具识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惬，辄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以俟参考。自游朱竹君先生之门<sup>⑥</sup>，先生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备知学术源流同异；以所闻见，证平日之见解，有幼时所见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时创见，或亦有关天授，特少时学力未充，无所取证，不能发挥尽至耳。从此所学益以坚定。著有《文史通义》一书，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sup>⑦</sup>，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sup>⑧</sup>，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易簮时<sup>⑨</sup>，以全稿付萧山王谷塍先生<sup>⑩</sup>，乞为校订，时嘉庆辛酉年也<sup>⑪</sup>。谷塍先生旋游道山<sup>⑫</sup>。道光丙戌<sup>⑬</sup>，长兄杼思<sup>⑭</sup>，自南中寄出原草<sup>⑮</sup>，并谷塍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先

录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鲁鱼<sup>①</sup>，别无定本，无从校正。庚寅辛卯<sup>②</sup>，幸得交洪洞刘子敬、华亭姚春木二先生<sup>③</sup>，将副本乞为覆勘。今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

道光壬辰十月男华绂谨识<sup>④</sup>。

### 【注释】

- ①先君子：语出《礼记·檀弓上》：“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孔颖达《疏》曰：“子之先君子，谓孔子也。”指已故的祖父。后世多称呼已故的父亲。
- ②亟亟(jí)：匆忙急迫的样子。
- ③先大父：对已故祖父的称呼。
- ④坟籍：语出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八《郭太传》：“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泛指古代典籍。
- ⑤章句之学：语出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二《韩韶传》：“子融，字元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指训诂之学，殚究一章一句之义。
- ⑥朱竹君：朱筠(1729—1781)，字美叔，一字竹君，号笥河，清代顺天府大兴(今属北京)人。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福建、安徽学政。绩学之士，多出其门。
- ⑦《官礼》：据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著录：“《周官经》六篇。”原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颜师古《注》曰：“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亦名《周官》、《周礼》，儒家六经之一。
- ⑧向、歆：西汉学者刘向和刘歆。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

字子政。汉成帝时，校阅中秘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刘向之子，与父总校群书，撰有《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⑨易箦(zé)：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春秋时期鲁国曾参临终，以寝室过于华美，不符合当时的礼制，命其子曾元扶起，撤换寝席。易席之后，返席未安而死。后世比喻人之将死。箦，竹席。

⑩王谷塍(chéng)：王宗炎（1755—1825 或 1826），字以徐，号谷塍，晚号晚闻居士，清代浙江萧山人。

⑪嘉庆辛酉：清仁宗嘉庆六年，公元 1801 年。

⑫道山：语出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东坡和陶诗》：“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寻又迁儋耳。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东坡至南昌，太守云：‘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原指仙山。后来称人死为归道山。

⑬道光丙戌：清宣宗道光六年，公元 1826 年。

⑭杼思：章学诚长子，名贻选，字杼思。

⑮南中：意为南方地区。

⑯亥豕鲁鱼：也作“鲁鱼亥豕”。亥豕，语出《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鲁鱼，语出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遐览》：“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指文字因字形相近而导致传写错误。

⑰庚寅辛卯：清宣宗道光十年至十一年，公元 1830—1831 年。

⑱洪洞刘子敬：刘师陆，字子敬，号青园，清代山西洪洞人。山西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华亭姚春木：姚椿（1777—1853），字春木，一字子寿，号樗寮，清代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区）人。以诗古文著名，讲学终其身。因为娄县是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从华亭县析出，故姚椿籍贯亦作华亭。

⑯道光壬辰：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男：儿子对父母的自称。

华绂：章学诚次子，名华绂，字緒迁。

### 【译文】

我已故的父亲幼年资质很愚钝，体质又瘦弱，少年时期在蒙童私塾读书，每天仅仅记诵百余字，常常表现出匆促费力的样子。祖父生前见此情景很怜惜他，从来不要求他必须完成课程。只是他天性对古代典籍痴迷，不愿意做训诂章句的学问。对于私塾教师教授的科举考试学业，不太上心。私塾课程稍有余暇，总是选取子部和史部书籍，日夜翻检阅读，孜孜不倦。读书每每具有独特的见识，知道哪些应当舍弃和择取，发现表意不恰当的地方，总是涂抹批改，有疑问之处随时记载下来，等待查找资料参考。自从进入朱竹君先生的门下，朱先生藏书非常丰富，因而得以遍览各种书籍，每天和学界名流讨论讲习，全面认识了学术发展的源流和内容的异同；用所闻所见的新知识，和平时的见解相互印证，则有在幼年时期形成，到老年时期而不改变的见识。这时才知道每个人一时的创见，或许也关系到先天的禀赋，只是因为少年时期学力尚未充实，没有东西可以拿来验证，所以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从此以后学习更加坚定。其著作有《文史通义》一书，书中倡导的言论和确立的意旨，大多属于前人没有阐发的思想。大概是从《周礼》中推求本原，而得到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传承，所以对于古往今来的学术源流，总是能够条别缕析而探得它们的宗旨。他临终前，把全部书稿托付给萧山王谷塍先生，请求代为校订，时间是在嘉庆辛酉年间。王谷塍先生不久离开人世。道光丙戌年间，我大哥章杼思，从南方寄来父亲原来的草稿，还有王谷塍先生校订完毕的目录一卷。经过查阅发现遗漏的内容还有很多，也有些地方与先父生前自己编订的篇目次序有差异，自然应当改正，以便恢复本来面目。先抄录成十六册副本，里面亥豕鲁鱼的错误，由于没有另外的校订本，没有办法参照校正。庚寅辛卯年间，有幸结识洪洞刘子敬、华亭姚春木二位先生，请求他们把副本重新校勘。现

在刊定成《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三卷，首先刊刻。还有一些零杂篇章，以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和文集等若干卷，应该等待校订之后，再做后续刊印。

道光壬辰年十月儿子章华缓恭敬记述。